

百年龙灯魂

——田园调查手记之六·关沮村

□ 叶继程

古镇关沮口的大年,被一场龙腾虎跃燃至酣畅。镇域周遭的叶儿河、藤子头、冯儿岗子等田野乡间里,关沮村的龙灯已在时光长河中舞动百年,叮叮咚咚绵延不绝。此俗溯源于本,相传老龙负气错降暴雨,致长湖水漫漶,生灵受扰,终获罪被斩。乡民感其灵韵,念其过往,建龙王庙奉祀,扎九节金龙敬香火以祭,礼俗渐成范式,世代相沿至今。这龙灯从非常民俗展演,是用稻草、青布与丝线织就的乡村史诗,是一代代手艺人以匠心镌刻的文化基因,更成了流淌在关沮人血脉里的精神图腾。2019年初夏,应谢大祥先生之邀,参与编纂《立新乡志》。乡域内搜集“社会风土”类史料时,来到关沮村。我拎着苹果、西瓜伴手礼,和主创一行三人,登门拜访始背之年的曾凡清老爷子。老人生于1928年,身为建国初期的老干部,伴随共和国成长。虽年逾九旬,但谈吐通透,思路明晰。龙灯百年流转的光阴轶事,烂熟于心。关于龙头扎制、龙衣染织与龙舞演绎的枝枝叶叶,在娓娓道来的氛围气息里渐次清晰,演绎成一幅鲜活立体的民俗画卷。

“半是人家半是水,半是帆船半是街”(叶继程诗),关沮村名依关沮口半边街而来。民国年间,偃旗息鼓的关沮村,仍浸润在农耕文明的温润雾气中。彼时的龙灯,是草把子龙,九节龙身皆以金黄稻草捆扎而成,漂亮的说法叫本真质朴,实质是因为生活窘困。收割后的稻草,骄阳下散发着丰收的喜悦。老人眯着眼,喝了一口凉茶,继续讲述:草龙制作全凭手艺人匠心,村民从稻田精选纤长柔韧的谷草,经晾晒去潮、熏蒸防虫后,以竹篾扎成工字形骨架,再将稻草一圈圈缠绕编织,从龙头的眼、角、须,到龙身的每一节草把,凝聚了乡人的巧思与智慧。这类草把龙灯在江汉平原并不鲜见,明末清初便已在水网湖区流传,既是百姓辞旧迎新的岁时仪式,亦是驱疫禳灾、祈愿平安的信仰寄托。

关沮龙灯队创始人,是曾凡清老人的祖父曾天锦。这位乡间艺人,用饱经风霜的双手,赋予干枯稻草鲜活之灵性。老人说,爷爷扎制的龙头神形皆俱,竹篾弯曲弧度拿捏精妙,龙须取细长稻草丝丝梳理,齐整顺滑,舞动时随风轻扬,宛若真龙吐息。那时的龙灯表演无繁杂套路,却藏着最原始蓬勃的生命力。每逢春节,一人擎龙珠引航抖擞,九名壮汉各执龙身,伴锣鼓铿锵穿行于古镇渡口、码头、村落。草龙时而蜿蜒游走,时而盘旋翻身,商户老板奉上香烟糖果,祈生意兴隆;襄河堤边泊船人家递上干鱼干虾,求航行顺遂;村民则向龙身撒掷大豆芝麻,盼龙神携灾祸远去。稻草混着泥土的清芬、锣鼓的铿锵节奏、乡人的欢笑声,交织成民国年间关沮口最动人的年节图景。元宵节过后,经一春舞动的草龙便在龙王庙前焚祭,火龙腾空,龙魂升天。来年再以新稻重扎,恰似庄稼枯荣轮回,岁岁延续生命希望。

建国前后,关沮村龙灯迎来首次蜕变,草把龙蜕变为十一节布龙灯。这一转变不只是材质更迭,更印刻着时代变迁在民俗文化上的痕迹。新任龙头传承人陈祖荣,未循稻草质朴旧制,转而选用更具质感的布料作龙衣。老人记得,龙衣原料是村民自家手纺白布,厚实透气,为让龙身显沉稳青韵,陈祖荣巧借荆楚千年植物染晒技艺,以乡野野果为染料调色。

那些染色用的果壳,多是乡间常见的青柿之类,未成熟时饱含单宁酸,是天然优

质染料。陈祖荣牵头村民采摘青果,以石臼捶捣成泥,滤出青涩汁液,将白布入锅与果泥同煮。染好的布料经反复晾晒,阳光与单宁酸发生奇妙反应,青色愈发温润醇厚、持久稳定,终成独特的青布青衣。十一节布龙较九节草龙更长,舞动时气势更恣狂傲娇。陈祖荣制龙头以竹篾扎骨,外蒙染好的青布,龙角削竹片裹布塑形,龙眼缝黑色布料点缀,炯炯有神,尽显威严。表演时,龙头引龙身于村落晒谷场,演绎“拜四方”“穿三门”等招式,东拜东岳大帝,南拜南海观音,西拜西方如来,北拜北斗七星,每一套动作皆承载村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殷切祈愿。布龙问世,让关沮村龙灯表演更具观赏性,也让这门手工艺材质升级更好传承。

1958年,人民公社成立。关沮村龙灯迎来最华丽的革新,十一节布龙龙灯横空出世。这一年,龙头传承之责交予陈德新,这位心灵手巧的艺人,在青布龙衣基础上添精刺绣花工艺,让龙灯从实用民俗道具,跃升为兼具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。二十一节龙身较以往更长,需更多人手参与表演,龙舞玩法与技巧亦愈发成熟鲜活,成就关沮村龙灯发展史的鼎盛时期。

绣花龙衣制作工序繁杂精细,先择染好的优质青布,由村中妇女合力绣花,五彩丝线在龙身、龙鳍、龙尾绣云纹、水纹等纹样,针脚细密匀整,色彩艳丽鲜活,龙灯舞动时流光溢彩,尽显灵动华贵。龙头制作更求精益,竹篾骨架愈发精巧,除传统眼、角、须外,新增诸多装饰细节,龙舌以红布裁制,龙齿用白丝线勾勒,威风凛凛,气势凛然。陈德新还改良龙身连接方式,以结实麻绳与竹圈衔接二十一节龙身,兼顾表演时的灵活度与连贯性。龙头在曾祥富的掌控下,稳稳地向上攀登,龙身随之蜿蜒缠绕,每一节皆由孔武有力的队员执掌,默契配合间步伐整齐划一,更见充沛力道适配桌面高度调整。曾凡清老人谈及过往,难掩欣喜:“1958年春节,我们与彼时声名远播的草市龙灯队(对!正是‘草市的龙灯玩转去了’俗语所指的队伍),同台竞技比拼,最终关沮大队龙灯胜出。那时大伙欣喜若狂,欢呼相拥,要知草市龙灯队在荆沙境内本就是赫赫有名的强队!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二十一节绣花龙灯传承人曾祥富,他延续陈德新的精湛工艺,将龙灯表演难度推向新高度——登七层方桌盘旋起舞。这一“螺旋登顶”式高难度动作,在民间舞龙中极为少见,挑战系数更甚。七张方桌层层叠叠,高达数米,曾祥富率舞龙队员伴锣鼓节拍,从底层稳步攀升,将龙灯缓缓盘旋至桌面顶端。

老人细细描摹当时盛况:表演当日全村人争相围观,人群围得水泄不通。龙头在曾祥富的掌控下,稳稳地向上攀登,龙身随之蜿蜒缠绕,每一节皆由孔武有力的队员执掌,默契配合间步伐整齐划一,更见充沛力道适配桌面高度调整。待龙头登顶,整具龙身盘旋成巨大螺旋,宛若蓄势腾飞的巨龙,台下掌声雷动,惊呼不绝。那时春节元宵,是关沮口最喧闹的时节,二十一节绣花龙灯在七层方桌盘旋的身影,成了一代代关沮人最深刻的集体记忆。

行文至此,让我想起一段陈年旧事。1987年8月,经张辉光先生举荐,我到关沮乡文化站任职。是年春节,值荆乡政府大楼,适逢关沮村龙灯队前来贺年。清一色的红衣灯笼裤的小伙子,腰缠黄

丝带,飞扬神采。在英武雄迈的龙灯队伍里,我瞥见发小陆景新,从龙衣中露出一脸憨笑。来不及打招呼,龙头便抖撒开来,金黄色龙躯随即盘旋而动,恍若游龙。喝彩声、鞭炮声、锣鼓声响成一片。现场人头攒动,气氛热烈,未曾与舞龙人交流。

曾凡清老人清了清嗓子接着说,舞龙灯从非一人之事,而是全村人的公共事业。制作龙灯时,男子扎骨架、染布料,女子绣花、缝龙衣,各司其职;表演时锣鼓队、舞龙队、后勤队分工明确,有人抬方桌、有人维持秩序,有人燃鞭炮助兴,同心协力。这般集体参与的模式,让龙灯文化深深扎根乡村土壤,成为维系邻里情感、凝聚村落力量的精神纽带。

而今,老人离开了锣鼓喧天、人潮涌动的舞龙现场,回溯龙灯往事如数家珍。每一位传承人的名姓、草龙扎制的工序、树果染色的清苦气息、七层方桌盘旋的壮阔盛景,仍镌刻于心。老人感慨:“龙灯是关沮村的魂,只要龙灯还在舞,村子的精气神就不会散。”这话让我深切体悟民俗文化的强劲生命力,它不是博物馆中静止的展品,而是活在人们记忆里、实践中、情感内的精神财富,是乡村文化的根脉所系。百年岁月流转,关沮村龙灯历经四代传承人更迭,从曾天锦的草龙、陈祖荣的布龙,到陈德新的绣花龙、曾祥富的高台龙,节数从九节增至二十一节,材质从稻草升级为绣花布,表演从平地舞动进阶至高台盘旋。每一次革新皆顺应时代潮流,却始终坚守核心文化基因——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传统文化的坚守。

今年初冬,因田园调查之需,我再度踏入关沮村,问及旧人旧事,才知曾凡清老人已驾鹤西去,昔日舞龙灯的鲜活身影亦难寻觅。乡土旧俗渐逝,乡愁再无依托,心底满是怅然。原以为那些关于龙灯的鲜活印记,会随岁月侵蚀日渐模糊,直至踏入曾祥富家中,目光撞见堂屋墙上悬挂的龙头,心头骤然一震,沉寂的记忆尽数唤醒。那龙头经岁月沉淀,无半分衰败之态,龙须依旧柔韧舒展,指尖轻触似能抚到往昔风动;龙眼嵌嵌于眼眶,凝眸凝视恍若藏着未竟锋芒,旧日神采丝毫不减。凝视这尊龙头,耳畔似又响起喧天的锣鼓声,眼前浮现二十一节绣花龙灯盘旋腾空的盛景;曾祥富执掌龙头稳步登高,龙身随节奏蜿蜒缠绕,七层方桌之上,巨龙昂首舒展,五彩丝线绣就的纹样在光影中流转,全村乡邻的喝彩声、鞭炮声交织回荡,年节里的热闹与赤诚扑面而来。那些未曾远去的传承故事,那些融入民俗信仰与期盼,从未因时光流逝褪色。这尊静静悬挂的龙头,早已超越民俗道具意义,是百年龙灯魂的具象承载,成为连接过往与当下的精神纽带。

关沮村的百年龙灯,是江汉平原民俗文化生动的缩影。它自田野走来,携稻草芬芳、青布温润、丝线细腻,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蜕变,始终坚守初心本真。它不只是一场视觉盛宴,更是一部鲜活的乡土历史,记录乡村变迁,承载人们的信仰与情感。龙灯之魂,是手艺人的极致匠心,是传承者的执着坚守,是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。

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,诸多传统民俗渐趋消逝,而关沮村龙灯昭示我们,唯有有人铭记,有人传承,有人热爱,这些文化瑰宝便能永葆生机。那些关于龙灯的过往故事,那些沉淀岁月的匠心与温情,终将永远铭刻在关沮村的记忆里。归来兮,百年龙灯魂!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「一户一韵」展家风 楹联点亮乡村魂

□ 张卫平

塑村庄之美,门前楹联成风景;铸精神之魂,笔下乡风润民心。

近日,荆州八岭山镇一道独特的风景引人注目:近三公里村路沿线,132户农家门前,镌刻着金色大字的红色楹联整齐悬挂,在冬日下熠熠生辉。这并非年节时的临时装扮,而是当地精心打造“楹联文化村”的常态举措。这些楹联,告别“千篇一律”,追求“一户一韵”,依据每个家庭的家风传承、职业特点量身定制,成为了农户独特的“文化身份证”。

这一创新实践,生动诠释了如何以楹联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媒介,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,实现从“塑形”到“铸魂”的升华。

以文化人,让传统瑰宝成为滋养人心的“源头活水”。美丽乡村,美在环境,更美在人文。八岭山镇的做法,其深刻之处在于超越了将传统文化作为点缀或景观的层面,而是让其真正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。荆州市诗词楹联学会组织联家深入农户家里开展“文化普查”,努力挖掘每家每户的“文化基因”,将“工匠精神”“耕读传家”“孝悌仁爱”等抽象价值理念,转化为悬挂于门楣之上、日日可见的具象楹联。

当“克勤克俭、惟读惟耕”成为家门口的座右铭时,便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,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家人的言行,涵养着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与淳朴民风,实现了“文化人”的浸润式治理。

激活主体,使村民从“旁观者”变为文化建设的“主人翁”。“一户一韵”的关键,在于“韵”从每家每户自身而来。这个过程,不仅是文化内容的定制,更是村民文化主体意识的唤醒。通过促膝长谈,梳理家训、物思生活,村民在参与中重新审视并珍视自身的文化传承。

当承载着自家特质与期盼的楹联悬挂门前,它不仅是家庭荣誉的象征,更是一份无声的承诺与激励,促使村民更加自觉地维护庭院的整洁、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,从“要我做”转向“我要做”,从“被动管理”转向“主动治理”。红红的楹联,如同一颗颗文化的种子,在村民心中生根发芽,凝聚成乡村振兴最宝贵的内生动力与主体活力。

赋能产业,为乡村振兴探索“文化+”的可持续发展路径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,文化振兴是根魂所在,亦能成为产业兴旺的催化剂。八岭山镇将楹联文化与乡村旅游、产业发展紧密结合,通过举办相关文化活动,推动静态文化展示向动态文旅体验转化,促进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延伸。传统文化赋能乡村建设,让文化不仅滋养精神,也能创造价值。当独特的“楹联文化村”成为乡村旅游打卡地,当楹联定制成为可参与、可体验的文旅项目,当楹联元素融入地方特产包装,传统文化才真正“活”了起来,转化为促进就业、增收致富的“软实力”与“新引擎”,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,为“以文兴业”提供了可操作的现实样本。

从统一标语到“一户一韵”,从环境整治到文化铸魂,八岭山镇的实践表明,美丽乡村建设迈向何处,必然呼唤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入。当地以楹联这一承载着千百年智慧与审美的小小载体为抓手,成功探索出一条激活传统、赋能当代、联结个体与集体的路径。振兴乡村文化,贵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,贵在贴近泥土、贴近民生。

唯有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融入乡村肌理,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,才能为广袤的乡土中国铸就不可替代的文化之魂,绘就形神兼备、永葆生机的振兴图景。

文化荆州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二〇二五年第五十八期 总第一百九十九期

翰墨荆楚(19)



千峰月色 五湖春光
作者 金伯兴

中国古代五等爵制及其与西方爵位的异同

□ 余大中

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,周成王“封熊绎于楚蛮,封以子男之田,姓半氏,居丹阳。”这就是说,当时,楚熊绎是通过分封诸侯的爵位,建立楚国,封地在荆山(位于今湖北南漳或保康一带),南方蛮荒之地,赐土方圆五十里,国都设在丹阳。因此,研究楚文化,有必要弄清楚中国古代爵位制度;同时,颇有趣的是,在西方也有爵位,它与中国古代爵位的异同,也值得一并探讨。

先说说中国古代五等爵制的来龙去脉。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汉书》等大量文献,都系统记载了周代五等爵制的等级和分封原则。比如,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:“王者之制禄爵,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凡五等”。确认了五等爵制。《左传》记载:“诸侯受命于周”。说明诸侯的爵位及其世袭,需要周天子册封。《汉书·卷二十八上·地理志第八上》记载:“周爵五等,而土三等:公、侯百里,伯七十里,子、男五十里。”进一步说明,分封诸侯爵位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,而封地大小为三等,其中,公爵和侯爵百里,伯爵七十里,子爵和男爵只有五十里。这就说明,楚熊绎所封,为第四等爵位,称为楚子,封地只有五十里。

西周实行分封制,主要目的是“藩屏周室”,维护统治。通过分封诸侯,周王室能够扩大统治范围,加强对地方的控制,确保政权稳定。分封的对象,主要包括三类:一是王族,即周王室同姓宗亲,比如姬姓贵族,他们被封到各地做诸侯,建立诸侯国,以拱卫王室。二是

功臣,为周王室立下战功的异姓贵族,因功受封,成为诸侯,享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力。三是先代贵族,即古代帝王的后代,和远氏族部落首领,被封为诸侯,以延续先代圣贤的血脉,巩固统治基础。楚熊绎似乎属于第二和第三类,两种条件都沾得上边。

关于五等爵制的分封内容,主要是授民授疆土和建立诸侯国。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,诸侯在封国内,享有世袭统治权。可在自己的封地内进行再分封,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卿大夫。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。诸侯在封国内,建立诸侯国,作为周王室藩屏。诸侯国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,享有一定的自治权,但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,向周王室缴纳贡物,并派兵随从周王作战。

五等爵制不仅代表等级尊卑,还直接关联封地规模、军事实力、朝贡礼仪等核心权益。比如,公爵,享有与周天子近臣同等的礼遇,封地多为战略要地或富庶区域,军事实力较强,朝见周天子时可享特殊礼仪,参与王室重大决策;侯爵,承担保卫周王室、镇守边疆的重要职责,拥有较多兵力,可在封国内设置官吏、征收赋税,是西周藩屏周室的主力;伯爵,封地多位于诸侯国之间或边疆过渡地带,承担联络、防御的辅助作用,军事实力中等,需定期向周天子朝贡、述职,服从周王室调遣;子爵,封地多在边疆或少数民族聚居区(比如楚熊绎,封地在今湖北荆山一带,

处于南方蛮夷之地),军事实力较弱,朝贡礼仪相对简化,需要依附邻近的大国或周王室保护;男爵,多为大国附庸,需向宗主国(或周天子)缴纳贡赋,服从调遣,没有独立的军事决策权。

实际上,中国古代五等爵制并非一劳永逸,而是不断变化的。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,随着周王室不断衰微,诸侯实力此消彼长,所封爵位与实际地位逐渐脱节,比如楚国君主自称“楚王”,突破了子爵的等级限制,但“公侯伯子男”的五等爵体系,仍然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爵位制度的雏形。但是,通过反复的历史演变,逐渐从分封实爵走向虚衔化,直至清朝,彻底终结。其详细内容,本文不予赘述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也有当代权威学者和权威文献,质疑五等爵制的真实性,他们认为,是战国时期学者臆测春秋宗法社会,得出了五等爵制的错误结论。这些学者和文献指出,金文里面的诸侯称谓,没有固定等级,称谓比较混乱,所谓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等级划分并不严谨,比如鲁国在《春秋》里称公,而彝铭中多称鲁侯;楚国在文献中称子,彝铭中却有称公、称王的。且金文中完全没有发现“男爵”的称谓。对此,需要进一步考证。

非常有趣的是,在西方也有五等爵制,它与中国古代五等爵制有什么关系?据笔者考证,是西方爵位(Duke, Marquess, Earl, Viscount, Baron),在翻译成中文时,被对应为中

国的“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”。这种对应关系,并不是简单的巧合,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,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制度时,一种深思熟虑和创造性的“格义”行为。

所谓“格义”,就是运用中国历史上已经固有的概念,来类比和解释外来概念的一种方法。晚清时期,中国学者和外交官,在翻译时,面临一个难题,就是如何理解陌生的西方爵位等级?于是,经过探讨,他们认为,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,就是借用中国人所熟知的五等爵制,让人一目了然。结果,就出现了中国与西方五等爵位看上去似乎一致的现象。实际上,中国与西方五等爵制,既有相同点,也有不同之处。

对比分析,中国与西方的五等爵制,相同点有三:一是等级性与仪式性,均以爵位标示社会地位,配合特定礼仪;二是君主授予,均由君主(或教宗)册封,具有权威性;三是历史的延续性和不断变化的特征,都从实权封建体系开始,然后逐渐虚衔化。

关于不同之处,可以概括为一句话: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与制度的产物。有文献认为,中国的五等爵制,是一个自上而下的、以血缘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、静态的行政分封体系;西方的五等爵制,则是一个自下而上构建的、以法律契约和军事义务为中心的、动态的封建领主体系。前者服务于“大一统”的理想秩序,后者则构成了一个权力分散的封建网络。